

·专访·

思考与探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

田晓明 徐维英

【编者按】对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过去的五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岁月。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学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科研管理文件。这些管理举措符合党中央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注意尊重学术发展规律,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使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回顾这一过程并为之欣慰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术管理者,内心都在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此前行,我们还能“走”多远?确实,五年来的实践探索,我们迈上了更高的台阶,同时也自然产生出“高原反应”。制度效用的消解和增长空间的限度使一系列现实问题接踵而至,管理转型改革势在必行。为此,我们采访了分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副校长田晓明教授。

—

徐维英(以下简称徐):田校长,近年来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学界也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您认为,这些成绩的主要支撑是什么?

田晓明(以下简称田):确实,通过几年来的艰难探索和共同努力,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赢得了积极的反响和良好的声誉。作为学校分管领导,我深感欣慰。我认为,这些成绩的获得,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必然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教师的辛勤劳动与付出;二是制度创新的效用。

徐:作为科研主体的教师,其辛勤劳动与付出当然是学校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与教师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非常关注学校的科研制度。是否可以这么说,学校科研管理制度的导向、激励功能在推动科研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田:学校科研事业的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的智慧与劳动。再好的制度,其导向、激励、控制等功能都要在“人”身上产生效用。所以我对全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怀着深深的敬意,没有大家的努力,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当然客观来看,一套尊重学理、符合实际、举措得力的科研管理规章,可以激发教师的科研热情,挖掘教师的科研潜力。因此,制度的效用对科研事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制度层面来看近年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我们的制度具有导向明确、务实可行、力度强

劲等特点,无论做纵向或横向比较,我们都应该充满自信。

徐:作为分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校领导,在制度设计方面,体现了您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把握和思考,您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田:正是因为制度拥有导向、激励、控制等功能,所以制度设计尤为关键。我有几点感受或体会:一是制度设计必须尊重学术发展规律。有悖于学理的制度设计,必然演绎荒诞,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将适得其反。二是制度设计必须符合实际情况。不同的组织拥有不同的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其所处背景、所控资源、所居地位等也不尽相同,因此,制度设计也必须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向一些著名大学学习,借鉴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但绝对不能背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我始终认为,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绝对不可以复制。别人的“好”,未必能够成为自己的“好”;在别

人看来的所谓“不好”,也未必就是“不好”。“好”与“不好”其实是相对的,要把握适用性原则,也就是说,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三是制度设计必须拥有一定的前瞻性。管理制度设计的主要依据是“过去的事实”,保留既往“事实”的成功经验,有效规避既往“事实”的失败教训,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内容。但制度设计不能仅限于此,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所谓前瞻,就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发展方向、态势进行预测,对可以预见的状况加以有效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应贯穿发展性思维。四是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可行性。尽管制度设计必须遵循学术发展规律,但表达为各种管理规章的制度系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与探讨,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就是能够有效付诸实践的“操作说明书”。换言之,没有可操作性,即便尊重学理,也是废纸一张。五是制度设计还必须留有“余地”。正因为制度设计应有一定的前瞻性,所以基于“预测”的制度表达极有可

本期要目

- 思考与探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专访田晓明副校长
- 金太军教授及其团队的应急管理研究成为政府决策依据
- 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助力文化“走出去”战略
- 以特色东吴智库建设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
-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提升文化建设软实力

·专访·



能存在“误判”，我们固然可以视其为制度体系的“系统误差”，但必须考虑到这种“系统误差”将会带来管理行为的偏差。因此在制度设计过程中，不能将“预测性前景”给予僵死、教条的规定，必须给管理实践留有一定的“调适空间”，以期获得纠正管理行为“偏差”的可能。我想，制度设计至少必须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考量，而且这是五位一体，缺一不可的。

徐：刚才您从理念层面对制度设计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能否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制度系统为例，从操作路径或技术路线层面，谈一谈制度设计的步骤与方法。

田：从操作路径看，制度设计一般经由调查研究、内容分类和文本写作三个具体环节。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制度系统为例，“调查研究”环节包含了对上级科研规划管理部门相关文件的学习与领会、兄弟高校情况比较分析、学校现状调查与分析等。“内容分类”是对管理制度系统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具体而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制度系统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核心期刊目录的确定和分类，二是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的相关条例，三是科研成果认定和评价的相关办法，四是学术规范管理条例，五是科研平台建设的相关条例，六是学术研究活动开展的有关规定。其实，内容分类也就是系统设计，这是管理思想的形成，具体的文本写作只是管理思想的体现。

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与关键。然而，在喧嚣浮躁的当今社会，日常工作（尤其是管理工作）中，调查研究之重要性似乎人人皆知，却很难落实，有时还存在如何面对不同话语的问题。大学学术期刊的遴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

是教师普遍关心的，但关注点往往集中在自己所在学科的期刊等级、数量等等，因而意见或建议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的个人利益色彩。对此，制度设计者往往很难形成一种符合学理性的决策意见或主张，最后的结果大多是一种“妥协”的产物。请问，您在主持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目录时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形？又是如何理性应对和妥善处置的？

田：你所说的情形确实客观存在，但总体而言，教师的意见还是充满智慧、尊重学理的。即便有极个别的意见存在偏颇，甚至缺少学理支撑，但也不足以影响整体决策意见的形成。当然，这对制度设计者的素质和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就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目录的甄选来说，我认为，学术期刊不仅是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也是学者和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交流、学术批评、推动学术发展的主要载体，因此，对学术期刊进行遴选、分类是学术研究管理的重要职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期刊种类繁多、良莠不齐，为了纯正学术研究风气，提高学术研究管理效益，引导和激励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独立、自由却不失规范地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有必要进行学术期刊的整理并确定核心期刊。实践证明，一套科学、合理且相对稳定的核心期刊目录体系，不仅具有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而且可以提高科研管理效益。

诚然，对于核心期刊的确定和分类，学界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学术作品的影响力在于其本身的思想性和创造性，而给学术成果表达的载体（如期刊）进行分类或定级，无疑是本末倒置；论文质量与发表的刊物之间并不存在等号，一流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也不一定是一流的。再则，论文的发表

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作者的知名度、编辑的素质等等。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要看其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不能仅看刊载它的期刊。还有期刊引用率的问题，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高低是变化的，而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热点问题、名家论文、综述类论文等引用率一般会高一些，反之则低。况且，即便引用率低，也不能说明论文的学术水平就一定低，有些论文由于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力，引用率也会很低，甚至无人引用，比如，孟德尔的遗传学论文在发表35年之后才为科学界发现和认同。此外，引用率的高低根本上取决于论文本身的质量，而不是取决于期刊。也就是说，质量差的论文即使发表在一流杂志上，引用率也不会高；而质量好的论文即便发表在一般期刊上，也会因为其高引用率而提升了所刊载期刊的知名度。比如，罗巴切夫斯基创立的非欧几何发表在《喀山大学学报》上，这本学报并不有名；阿贝尔的论文发表在当时并无多少影响的《纯粹和应用数学杂志》上，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够数学家们忙上五百年”。这些不太有名的期刊后来因此而出名了。因此，有学者认为，把杂志分成三六九等，以此来衡量学术水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索引本来是一种工具，不是衡量学术的根本标志，也不能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且，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或强化了以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术的弊端。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环境——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也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期刊分类，量化考核却给学者们附加了越来越多的束缚。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是依靠论文数量得以提升，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也只有在长时期的稳定、宽松的环境中这种积累才有实现的可能。

上面所列举的种种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批判也十分深刻，我内心也认可这些看法。但这里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其中存在着某些不合理因素甚至缺陷，就从根本上排斥甚至否定学术期刊分类以及核心期刊确认的合理性存在。对学术管理者而言，更需要保持理性态度。

从逻辑上看，假如对学术研究的考核和评价必须充分体现“十年冷板凳”、“数十年磨一剑”之“胸怀”，耐心地等待“名山之作”、“传世之作”以及“大师”的出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核和评价的周期确定为十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专访•

呢?如是,大学教师的科研考核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显然,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悖谬。基于这种认知的观点难以成立,即便成立,学者们也不能普遍认同和接受。因此,我认为,相对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分类是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机械、教条地套用某种考核或评价体系,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应当在规范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学术规律,灵活运用“例外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将考核或评价体系之系统误差所带来的管理行为偏差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目录的确定方面,本土大学基本采取两种做法:一是全盘套用有关社会评价机构所研发的核心期刊体系,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源期刊等。这种做法因社会公认度较高,故而具有一定普遍性。但因其没有兼顾大学自身的学科实际,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遭遇来自大学内部的阻力。二是在大学内部各学科权威人士推荐基础上,管理层再按一定比例下达核心期刊目录之指标数。这种做法其实是大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博弈与平衡,其结果往往是乱象丛生。由于缺少学术公认度,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相反还会滋生学术腐败,因此,广受学界诟病。显然,上述两种做法都有极端化倾向,科学的学术管理必须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在这方面,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是一个经典的范例,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公认度。为了建立适合中国背景、符合学校实际的核心期刊目录体系,我系统分析、研究了 SSCI 分级理念,从中获取了科学、合理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尽管学界对 SSCI 的认识也有反对意见,比如,有学者对 SSCI 源期刊的国家分布、英文表达提出过尖锐批判。我认为,这些意见之于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分中肯,在管理实践中应尽量吸收。

徐:我校在合理借鉴和吸收 SSCI 期刊分类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对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进行了分类和遴选,作为主导者请您谈谈具体的思路 and 做法。

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比较审慎地选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作为学术期刊遴选的基本内容。这一选择的主要考量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受国家教育部委托、由南京大学与香

港科技大学合作,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而研制的,不仅极大地尊重了人文社科的学科发展特点,同时也兼顾了当下中国内地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考核的通行做法,因此,这套系统不仅获得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同,在(国)外学界也有相当的认同度。

在 CSSCI 源期刊(2008-2009)中,共收录了包括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教育学、体育学、统计学、心理学、人文与经济地理、环境科学以及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高校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等 25 个学科门类 528 种学术期刊。按照这 25 个门类,我分别对期刊的影响因子(IF)进行了统计和排序,并采用布拉德福德定律划分成三类,并以此作为核心期刊之基本目录。

此外,综合考虑到国际期刊以及大学本身的学科具体情况,对我校核心期刊目录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原则有五:一是根据以上规则所确定的 CSSCI 源期刊的一类核心期刊不变,增加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之源期刊(其他外文期刊由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鉴定);二是兼顾学校学科分布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在二类和三类期刊中适当进行微调;三是对体育学、艺术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特色学科核心期刊的确定,可以适当从 CSSCI 源期刊(扩展版)中选择性增加到三类核心期刊;四是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文摘类期刊以及《光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等转载(摘)或发表的论文,纳入二类核心期刊计;五是交叉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在自然科学类期刊发表论文,按照自然科学类期刊要求计。这样《苏州大学核心期刊目

录》(人文社会科学版)便产生了。

徐:正因为进行了扎实的前期调查研究,使得原本十分敏感、困难的核心期刊目录遴选工作顺利推进,并在教师中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可。我还想问的是,核心期刊目录的确定只是制度设计的基础工作之一,在后续制度设计(如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奖励等管理条文的制定)过程中,您又是如何把握的?

田:后续管理条文的制定,同样是基于细致、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学术水平的评价、考核和奖励等尺度的把握,必须基于对教师科研情况全面、细致的了解,同时还必须进行兄弟高校间之横向比较。

自 2007 年 9 月起,我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对我校教师科研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首先,借助《中国期刊网》,全面而详尽地分析了 1979 年至 2007 年近 30 年间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已经去世的、离退休的、在职的、引进人员以及已经调离的等五类教师)在人文社会科学类一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删去会议综述、译介和书评三类文章)。论文的检索按照 CSSCI 的 25 个学科门类或期刊类型分别进行。在此基础上,借助于 CSSCI 数据库所提供的期刊影响因子和影响广度等信息,以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学术奖励、学术影响等 4 个经度和发文数量的学者排名、发文数量的学科排名以及论文引用检索数量的学科排名等 3 个纬度为分析框架,截取了 2000 年至 2004 年 5 年间的历史片段,深度分析了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研究状况,并与省内外相关高校(如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进行了横向比较,获得了比较丰富而清晰的数据资料。这些比较扎实的基础性调查研究,使我在后续制度设计过程中拥有了自信。

徐: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您先后主持制定了《苏州大学核心期刊目录》、



·专访·

《苏州大学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苏州大学科研成果认定与登记办法》、《苏州大学学术管理条例》、《苏州大学校级科研基金管理办法》、《苏州大学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管理暂行办法》、《苏州大学优秀研究成果奖评选办法》、《苏州大学科研档案管理办法》、《苏州大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一系列管理条例,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术管理制度系统。这一管理制度系统的建立,对推进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效果如何?

田:我不太喜欢用一些定量指标来表达近年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业绩,因为这些所谓的硬性指标,总给人以“冷冰冰”的感受,而缺少大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与情怀。但是,作为一种参考或一种视角,这些指标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步和成效。从科研项目看,2006年之前,我校教师所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都在个位数徘徊,其后的5年间,教师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均在20项之上,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达到5项;从科研经费看,2006年度科研经费只有250万元,2012年已经达到近4000万元,2012年度横向项目经费更是2006年度的125倍;从科研成果看,教师在一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从2006年的36篇(年度)增长至2012年128篇(年度),其中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15篇,是2006年之前总数的50%。图书馆科技查新结果表明,教师在SSCI上发表论文数直线上升,连年刷新历史记录;从学科点看,2006年只有中国语言文学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至2012年,我们已经拥有了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也从2006年的4个增长为12个。

我还是那句话,这些成绩的取得,主

要来源于广大教师的艰辛劳动与极大付出,制度创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激励作用,制度越是合理科学,其激励作用就越显著。这一点,正是近五年的发展实践所证明的。

二

徐:正如您所说,制度设计的主要依据是“过去的事实”,同时要保持“前瞻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一定遭遇到一些新情况或新问题,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您认为应如何保证制度顺利有效运行和管理举措落实?

田:确实,制度设计的基本内容是基于“过去的事实”,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即便考虑到一定的前瞻,但从本质上讲,这毕竟是一种“预测”。在现实中必然会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验和预测往往不能完全应对当下。当然,对于新情况、新问题要辩证分析。经过分析,如果发现不是根本性问题,我们将坚持制度的正常运行,这是管理稳定性的要求;如果发现问题涉及到根本原则,我们将随时进行修订和完善。比如,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目录的确定依据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而CSSCI每两年调整一次,那么,我们的核心期刊目录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微调。在现实中,我们也难免碰到一些特殊情况,而这些情况又是制度本身没有“覆盖”到的,甚至制度设计时无法“覆盖”。此时,我们将会有效利用制度设计时预留的“余地”或“空间”,进行“例外”处理。这就是所谓的“例外原则”,这同样是符合管理学原理的。

徐:何谓“例外原则”?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或举例说明这一“原则”。

田:“例外原则”的提出,主要用来弥补科研成果评价的规章制度未必周延之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十分复杂,很难操作但又必须面对和处置。言及大学科研评价的问题,我们必然面临着一系列递进式追问:首先,教师的科研工作要不要考核?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没有考核的评鉴、奖惩,工作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次,教师的科研工作如何考核?科学的考核隐含着客观、公正、公平的要求,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须拥有相对统一的评价体系。强调评价体系的统一性,无论是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必然会遇到实际操作困难。这种不可避免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学科间的差异和学科的特点。我认为,这是评价体系的系统误差。统计理论认为,任何系统误差都是无法根本消除的。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确定评价体系时尽量使系统误差最小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系统误差的存在,便全盘否定整个评价系统的合理存在。再次,如何修正或弥补评价体系之系统误差所带来的管理行为偏差?既然系统误差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那么管理行为的偏差就无法完全避免,这就需要对管理行为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完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正和完善是在不改变系统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具体到大学学术评价而言,就是在总体评价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尊重学科特点和学科间差异,制定补充细则,完善评价系统。管理学将这种修正和完善称之为“例外原则”。

在现实中,我们不乏这样的案例。比如,一所大学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著名学者,或者说,这所大学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位著名学者而闻名。在人事管理过程中,如果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对照一些硬性指标(如退休年龄、科研考核指标等),这些“大师级”学者必须到龄退休,这无疑是学科、学校的损失;反之,如果不严格执行既有文件规定,延长这些学者的退休年龄,又会引发“不公平”、“不公正”等诸多议论和质疑。显然,这是一对矛盾。对此如果根据制度设计时留下的“余地”,运用“例外原则”,就可以比较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从制度建设角度看,这非但不是对制度的破坏,反而是对制度体系的健全。

徐:“例外原则”的执行,往往赋予了政策的制定者或实施者个人高度的主观裁量权,因此,这一原则的实施将基于个人的知识、能力、胸怀、胆识等基本素质。这是否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因为一项政策的执行如果高度依赖于个体的判断,就容



·专访·



易发生公正、公平缺失等现象,甚至滋生腐败。对此,您是如何认识和处置的?

田:是的,在执行“例外原则”时,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一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如果主要基于制度设计者或执行者的个人素质,那这项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甚至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的效用消解、甚至系统崩溃。但是,我说的“例外原则”不是“无原则”的“例外”。我曾经打了个比方:我们选择评价体系,就如同评价一只水桶。这只水桶可以由黄金制成,也可以是木板打造,“黄金”和“木板”涉及评价体系的價值估量。假如水桶有一漏洞,不论是黄金桶,还是木板桶,由于漏洞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其盛水功能。为了保证它的盛水功能,人们或用黄金修补,也可以选用一块烂抹布堵塞。尽管黄金与抹布之间价值悬殊,但就其功能而言,其用途是一样的。因此,在考量和选择我们所选用的评价系统时,需要整体性思维,需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纠结于局部和片面的细节。如果在总体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个体赋予主观裁量权并给予严格监督和有效限制,其管理效用将增加,而且不会引发制度体系的效用消解和系统崩溃。

徐:确实,我们从与教师交流和社会反响中,已经感受到学校科研管理制度的显著效用;在我们的交流中,也能感受到您对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高度自信。我想问的是,这种自信是否意味着您对该套管理制度的坚守?

田: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因为制度设计不仅基于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且实践效用十分显著,所以,我对制度设计的理念充满自信,这无疑应当坚守;二是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当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制度的不适应性就会凸

显,修正与完善也是势在必行的。

徐:时至今日,您认为学校科研管理制度的效用是否一如既往?您是否考虑过修正和完善呢?假如有这样的思考,又将如何进行?

田:是的。我个人认为,经过五年多的实践与探索,我们的制度系统已经发挥了十分显著的效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效用已不再如从前,制度的修订和完善是大势所趋。至于如何修订和完善,这又必须回归到制度设计之初的愿景上来。以科研项目为例吧,2006年之前,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国家级科研项目都在个位数徘徊,为了有效激发教师争取项目的情緒和潜力,我们设计了“项目经费配套”举措。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尽管我们不能说“经费配套”是教师项目申请热情高涨的唯一动因,但“经费配套”发挥了应有的功效。我认为,这项举措的出台,不仅符合学校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有良好的目标预期,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初始判断。

时至今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是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还是科研成果、科研平台,这些所谓的硬性评价指标都获得了显著提高,学校学科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也获得了显著提升。作为学术管理者,我在欣慰、自豪的同时,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高原现象”正迎面袭来。袭用既有的管理制度,在既定的道路上,我们到底还能“走”多远?事实上,像我们这样层次的学校,在一些数量指标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当初的制度效用也已风光不再。转换发展思路,改变发展路径,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话题。在即将进行的制度修订和完善中,我认为,“取消配套”、“调整奖励”和“保留培育”三点想法可能成为着力点。

徐:请您谈谈“取消配套”、“调整奖励”和“保留培育”三点具体想法背后所

隐含的理念!

田:谈不上什么“隐含”,其实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顺势而为”。“取消配套”、“调整奖励”和“保留培育”三点考虑,主要基于管理理念的转换,即从“数量提高”向“质量提升”的转换。关于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大家耳熟能详,不再赘言。归根结底,没有一定数量的保证,便是妄谈质量。当初制度设计的主旨就是提高一些数量指标,这也是大学有效提升办学水平、提升办学实力的必要前提。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尤其是进入“高原期”,必须回归到“质量提升”这一主题。因此,及时修订和完善制度系统,向内涵发展、质量提升方向做政策倾斜,是大学管理者的必然选择。无疑,这是制度设计的一种科学导向。“项目经费配套”这一举措的出台,对科研项目数量的提升具有激励功能,“保留配套”便是对数量提高的“强化”或“维持”,而“取消配套”,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对数量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会从根本上消解教师的项目申请热情。再有,学校同时考虑“调整奖励”和“保留培育”,这将有力保证数量的稳定和质量的提升。“调整奖励”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即引导教师不仅要获得项目支持,还应为优秀成果的产出辛勤劳动,更要为学术品牌(如“东吴学派”)的打造倾心竭力。“保留培育”对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激励和培养意义非凡。我们预期,这些改革举措必将更有力地推动学校事业的发展。

三

徐:您刚才谈到,为了从“提高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将推行“取消配套”、“调整奖励”和“保留培育”等制度改革举措。除此以外,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方面,学校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举措吗?

田:其实,“取消配套”、“调整奖励”和“保留培育”等举措,并非科研管理改革的重点,从本质上说,这些举措的出台只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和修正。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学校将在管理理念上进行重大调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校园建设;二是师资队伍建设;三是社会服务功能提升。这是新的系统性举措,正在积极酝酿之中。

徐:无论是文化校园建设,还是师资队伍建设和社会服务功能提升,内容都十分丰富。这些工作的推进,将涉及到学

·专访·

校方方面面,无疑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以文化校园建设为例吧,我注意到,你提出了“文化校园”这一新概念,这与“校园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某些差异。您是怎样界定和把握这一概念的?

田:“文化校园”这一概念,并非我所提出的。这是我与一位大学校长出身的著名文化学者交流时所获得的一个新概念。在这位学者看来,大学应该建成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文化校园”,把大学的课上课下,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大学的一草一木,大学的每一景观、每一机制,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渗透浓厚的人文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诚信、仁爱、自律、责任等现代人文气息,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独立思考的自由本质。大学如果离开了人文精神,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大学文化。记得美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先有哈佛,后有

一谈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

田:借用黑格尔的一个比喻来说吧,“文化像洋葱头,它的皮就是肉,肉也是皮;如果把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肉了。”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曾说:“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样式”,我比较认同这一说法。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要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

徐:我当然认同您的观点,但我有一个疑惑:您分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化校园”建设似乎是两项不同的工

于这一伟大的时代背景;具体而言,与以下几方面的经历和思考有关。

首先,海外之行的心灵震撼。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总体国民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观察之后,也自然萌生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为何在异国他乡可闻可见,却在本土缺少彰显?去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2013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访问台湾。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给我的印象深刻,也加深了我的感触:在日常交往以及对古老街景的观察中,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得比较系统。反观大陆,几十年来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也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汲取苏联计划经济“洋经”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文革”期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天灾人祸”,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同步得以弘扬,甚至出现了丧失的现象。这是海外之行给我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致力强化经济“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国策已应运而生。

其次,文化建设的大学使命。大学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和主要阵地,她不仅要运用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高级人才的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人们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涵盖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几项主要任务。但从学理上讲,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并非并列的要素。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再有,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本质内涵。那么,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文化的启蒙、文化的传承、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



美利坚”,就是体现这个意思。我们从事教育,只有超越工具化、功利化的培养模式,才能够回归大学文化的本质,这才是社会的希望之所在、人的幸福之所系。我十分赞同这位文化学者的观点。“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三年前,我就曾建议把相关文件中“校园文化建设”改成了“文化校园建设”。文化是什么?我们很难给予十分权威的定义,但我们可以讨论和评价现实生活中“什么是文化”,甚至可以批评“什么是文化缺失”,或“什么没有文化”。在高等学府,将文化狭隘、简单地理解成学生的文体娱乐活动,显然是文化的缺失。如何加强大学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探索的问题很多。

徐:“文化”是一个十分难以定义的概念,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请谈

作,您为何将文化校园建设工作纳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呢?

田:确实,这是两项不同的工作,但是二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可能因为我对“文化校园”有一定的独特理解,因此校长将“文化校园”建设工作交由我负责。这固然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分工,但从主观上说,我也想探寻“文化校园”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从客观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其成果转化为“文化校园”的实践有许多有利条件。

徐:我能感受到您对“文化校园”建设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请问,这种使命感从何而来?能否展开谈一下您对“文化校园”建设的理解?

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十分愿意跟你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可以这么说,关于“文化校园”建设的问题,缘起

·专访·

承、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传承、创新人类文化是大学主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再次,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尴尬。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因此,文化研究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目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的当今时代,被称之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的现实成果表达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尤其是各级政府决策者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凡此种种,形成了文化建设的多重困境。

第四,大学校长的文化忧思。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那么,大学校长的主要责任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这是大学校长应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在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以人为本,这是制度文化的表达;在氛围营造过程中,如何纯化风气,这是精神文化的彰显;在校园建设过程中,如何体现特色,这是物质文化的呈现。以大学为例,校徽、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是文化建设的体现,而博物馆、书画院的创建,则无疑是文化名片的打造。在推进这些文化建设具体事项的过程中,作为主持者,我深切感受到,真正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拥有的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豪,而是深深的焦虑和遗憾。在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碎片”面前,我感到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我们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去落实、去实现。

最后,区域发展的现实契机。苏州是一座以底蕴深厚、经济发达而闻名遐迩,令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勤劳智慧的苏州人民正以古典园林的艺术精心打造现代经济的版块、用双面绣绝活巧妙实现中西文化的和谐对接。洋溢着古韵今风的姑苏城,在城镇化、城市化的发展浪潮中,前所未有地重视文化的建设。天赐庄文化景区建设工程的上马,便是最好的例证。尽管本人意识深处并不赞成甚至反对文化建设以“工程”名义出现,但看到地方政府能够史无前例地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内心还是倍感欢欣!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古老的东吴大学校园坐落于天赐庄地段,作为其中一分子,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可以说,加强文化校园建设和研究,不仅是区域发展赋予的时代契机,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担当。

四

徐: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是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而最根本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一定意义上说,谁拥有了一流的人才,就意味着拥有了一流的学科和大学,也就拥有了话语权。在下一轮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改革中,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应该说,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学科建设的关键。既然作为一项关键性工作,它应该常态化,何以成为学校科研管理转型的一项举措呢?进一步说,您认为学校在既往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

田:正如你所言,事业的发展,人才是关键。这一道理在学校自然科学学科突出的发展成就中已经得到了有力佐证。可以说,近年来学校自然科学事业的飞速发展主要取决于师资队伍建设。相比较而言,这些年学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尤其是人才引进)稍显滞后。我认为,个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学校在财力有限的前提下,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尽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被列为“稍后发展”的序列,但我对此完全理解并充分认同和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学校忽视或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而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行为选择。二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自身固有的特点,师资补充(尤其是著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引进)确实较自然科学学科困难。而今,经

过数年努力,学校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转向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师资队伍,也就成为情理中的事。当然,人文社会科学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没有因为身处“稍后发展”序列而停滞不前或毫无建树,“稍后发展”,只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学科而言。

徐:您刚才说,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其师资补充(尤其是著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引进)较自然科学学科困难。请问,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哪些特点制约了其师资队伍建设?

田:人文社会科学固有的特点,也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因此,试图了解人文社会科学之特点,必须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中才能获得。我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两者的差异:

首先,自然科学研究大多具有“高度协作性”。在这种协作过程中,即便是团队领袖人物(如院士),也能充分意识到团队中最基层人物(如实验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样,即便是团队中最基层人物也会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神圣与伟大。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必须齐心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团队精神便成了他们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与自然科学研究这种“高度协作性”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基础研究则具有“高度独立性”。科研的性质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研究对象永远置于客体地位,而将自身永远放在主体地位,这种主客体位置的摆布使得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得以深化。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以及自身学术地位的不断提升,其主体意识也将不断强化。这谈不上有什么不好,只是如果没有理性的把控,这种日益强化的主体意识带入现实生活 and 人际交往,极有可能泛化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其次,自然科学学科、专业、方向之间存在着“高度独立性”。一旦跨出自己的研究领域,自然科学研究者便因为自身知识的局限而很少有人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在自然科学界极少有人跨领域对其他学科、专业、方向的研究工作说长道短,即便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同行,彼此之间的评价也比较谨慎和小心。区别于自然科学学科、专业、方向之间的“高度独立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和方向之间则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间便拥有了学术评价的“话语普适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目睹到这样的情形: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不仅可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

·专访·

者面前侃侃而谈，也能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专家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话语。这是自然科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甚至无法理解的。

再次，自然科学研究没有国界的限制，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而且研究结论的验证简捷明了。围绕研究的假设，依照科学的规律与逻辑，以历史的、现实的被验证成功的事实作为依据，进行严密的证明、推理和实验，其结论要么是对研究假设的证实，要么是对研究假设的证伪，在一系列证实或证伪中，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研究过程（如证明、推理和实验等）的“可重复性”使得其结论更加客观、更令人信服。与自然科学研究结论验证的简明性和可重复性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表现形态往往是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或一种新颖的观念，甚至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说法”。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带有十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还受制于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即便是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文化传统，也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不同的色彩。这种高度的意识形态性和研究结论验证的复杂性便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十分“柔性”。确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论的真伪验证，需要假以很长的时日甚至是悠久的年代，这不仅需要人们给予充分的耐心和智慧，更需要人们拥有宽容的胸襟和非凡的胆识。

徐：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是否也与地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是否对人才引进也有影响？

田：是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水平与其所在城市的政治、文化地位和定位高度相关。一定意义上讲，地处省会城市的大学一般不及地处首都的大学，而地处省辖市的大学一般也不及地处省会城市的大学。即便地方大学拥有着某种区域性研究特色，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学科层次，还是高级人才的聚集度，都将无法与地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大学相比拟。这种地缘政治力的影响，我们是无法忽视的。因此，对地处省辖市的地方大学而言，引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著名学者）就相对困难了许多。

徐：确实，与自然科学学者的“单纯”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多了几分“复杂”。我们不时看到人文学者原本纯粹的学术之争容易演变成“地位之争”和“门派之争”，甚至是“态度对抗”。加之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理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性”侵蚀，利益纷争可能使原本紧张的人际关系更趋复杂，并波及整个学科，乃至整个学校和学界。您作为学者和管理者，对此一定有切身的感受。

田：是啊！对“文科”和“理科”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必须从学科分类的本质属性上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使结论客观公正。记得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科学研究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业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我对这段文字有两点理解：一是，学者要从“得意”之中意识到“不得已”，更要“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精力专注于某一事业，“不得不”收敛自身有意或无意被放大的话语权。二是，学科的分类与工作的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其本身并无贵贱、轻重之分。人类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将事物进行分类、对工作进行分工，这恰恰是人类智性的一种表现。倘若对这样的分类和分工缺乏本质理解，对他者的学术工作缺少尊重，却囿于自身学科的有限知识去妄论其他学科的是非与长短，这不仅是智性的缺失，也会衍生出无知与荒唐！

徐：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您有哪些举措或考量？

田：师资队伍建设的理念依然是“有计划培养、有选择性引进”，要有效践行这一理念，还有大量、过细的工作需要落实，我不赘言。我想说的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还必须完善科研管理机制。具体说，要通过“驻院”研究，精心培育科研团队，探索一条坚实、有效的科研平台建设路径。

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人文研究高度“依赖”学者个体的“顿悟”，但科研平台之于文科学者、科研团队的重要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平台的建设十分艰难。华勒斯坦曾说：“学科与壁垒是一对孪生姐妹”。在特定条件下，学科之间的壁垒会成为学科本身发展的藩篱；加之现行大学办学体制之制约，学校之间、院系之间还存在着强大而无形的“行政壁垒”，这同样是严重制约学科发展的消极因素。对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机构建设，有人曾通俗地形容：“一抓就

空、一放就死”。基于这样的分析，在保留原有行政功能的基础上，学校将“人文社会科学处”改名为“人文社会科学院”，这一字之差，并不是简单文字游戏，个中隐含着一种革新理念：顶层设计、上层推动。具体而言，就是努力打破学科之间壁垒和院系之间的行政壁垒，在学校层面有效整合优质学术资源，精心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研团队，培育经得起历史和学术考验的优秀成果，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

五

徐：无论是文化校园建设，还是师资队伍建设，一般看来都属于基础性工作，与您所提出的学校科研管理转型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可以感受到，您在这些基础性工作的背后，似乎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考量。

田：是的，一直以来，我怀有一种愿景或梦想，这就是致力打造学术品牌——东吴学派。具体说，学校相继推行的“东吴学者”、“东吴讲座教授”、“东吴特聘教授”、“东吴创新团队”、“东吴论坛”、“东吴大讲堂”、“东吴文库”、“东吴智库”等举措，都是“东吴学派”内容的具体体现。你所言没错，无论是“文化校园”建设，还是师资队伍建设，都属于基础性工作，但是，如果将刚才所列举的若干举措融入文化校园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你就能比较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梦想或愿景。诚然，真正实现这一梦想或愿景，还必须回归到大学的本质，即从文化的视角或层面来分析大学科研管理的转型。

徐：从文化层面来考察大学科研管理转型，会形成新的改革举措吗？

田：当然能够提供思考问题的新的路向。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而文化具有开放性和保守性两大特征。就其保守性而言，大学必须坚守“精神家园”，在这种坚守中传承文化，使学生获得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大学可以没有“物理围墙”，但不可没有“精神围墙”，大学必须小心维护着与社会的距离。如果大学堕落成为社会的“技术服务站”和“员工加工厂”，这不仅是大学的黄昏，也是人类精神的日落。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看，大学又必须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文化。因此，真正有效的科研管理转型，还必须努力提升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徐：您能否谈一谈学校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总体思路？

·专访·



田：大学，尤其是地方大学，应该秉持“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的理念，在精心呵护精神家园的同时，“推倒”大学的“物理围墙”，密切与地方政府、行业的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的人才、学科优势，以建设“东吴智库”为抓手，努力打造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库、智囊团和引领者，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务实高效、尊重规律、前景广阔的办学之路。

徐：文科谈社会服务有自身的局限，也有一定的优势。我校在这个方面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田：大家知道，苏州不仅是具有深厚底蕴和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一方热土，对高校的人才、智力、技术等需求更为迫切。顺应这一形势要求，苏州大学率先于全省乃至全国高校，在办学模式上突破传统思维，大胆创新社会服务机制。“苏州人力资源研究所”、“苏州大学人口研究所”、“苏州大学台商投资与发展研究所”、“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等一批合作研究机构的成立，正是这一新型社会服务机制的重要标志。应该说，这种“以合作机构为平台、以项目投放为载体、以成果共享为目的”的运作方式，消除了大学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的隔阂，突破了传统财政体制下科研经费投入的束缚，构建了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机制。

徐：这些举措出台之初，在与教师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教师内心的隐忧。他们担心，学校过分强调社会服务，是否会导致学术研究的“退化”。事实上，在很多教师内心有这样的认识，社会服务只是“贴补家用”的一种无奈之举，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或者说，社会服务并不需要真正学术水平，社会服务也不需要学术能力。因此，很多教师对社会服务怀有

一种不屑甚至排斥的态度。对此，您是如何认识和妥善应对的？

田：确实，在很多教师内心深处，看不起社会服务工作。显然，这是一种偏颇的思想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反思教师原先的科研工作，你就可以发现，大多数教师的科研工作属于远离社会现实、凭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书斋式”研究，即便偶尔有一些横向研究任务，也多是一些“游离式”的单干。我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教师盲目地看轻横向合作研究，存在着社会服务项目学术水平较低的先验意识；二是学校科研考核机制存在偏差，“重纵向、轻横向”的科研管理思想严重制约着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当初制度设计过程中，我们有效进行了规整。学校在制度层面积极鼓励教师开展横向项目研究，直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展“接地气”的学术活动。对其研究成果的考核和验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项目验收不再是传统的论文（著）提交，而是既有理论支撑、又必须具有很强操作性的研究报告或对策建议。这一科研成果评价形式的改变，客观上也鼓励广大教师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探询原因、找出答案、提供建议。在潜移默化中，教师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问题意识得到了锻炼、提升和强化，思想碰撞、学术交流的风气日渐形成，大大提高了科研能力和科研质量。更有说服力的是，随着这项工作的强力推进，很多教师将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将问题意识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主动将研究面向社会现实，并直接介入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指南的制定工作。事实证明，社会服务非但没有消解学术研究，相反大力促进了学校科研事业的发展。2007年以来，教师所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和层次

显著提升，便是最好的佐证。也正是这些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使我坚定了致力打造“东吴智库”的信心和决心。

徐：您认为打造“东吴智库”对提升科研绩效、改变科研取向乃至学术生态也具有一定意义？

田：是的。从绩效上看，近年来教师所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和层次的大幅攀升了，但相比较而言，我更看重以下几点成功的经验：一是突破了地方财政体制的束缚。作为省属高校，苏州大学尽管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但不属当地财政体系覆盖之列。与苏州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共建研究平台，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和突破。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以项目形式给予经费支持，很大程度上弥补和缓解了学校科研经费之不足，真正有效践行了“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的理念。二是促进了优质科研资源的整合和优秀科研团队的培育。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人力资源的整合，在这种整合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教师原先“跑单帮”式的横向科研工作，渐渐孕育成为“跑马帮”模式。这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样的感受还有很多，每一种新的正向变化都会给我以鼓励，增强内在的自信。

徐：最后，我想问一个带有“私人”色彩的话题。您是一名学者，同时又是一名学术管理者，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社会角色之间充满着张力甚至矛盾，您这一路走来，一定备尝“得”与“失”的感受，能否披露一些？

田：确实，我一路走来，感触良多，个中不乏获得成功的喜悦，也有遭遇挫折乃至失败的苦楚和无奈。在工作和事业上，我深知不足之处还很多，提升的空间也很大。你提到了学者和管理者的“张力”和“矛盾”，使我有些感触，不妨表露一点心迹：作为一名学者和读书人，面对冗繁复杂的工作环境，自然不愿意摧眉折腰，不愿放下矜持的架子 and 尊贵的身段；但作为一名管理者，为了成就一番事业，又不可能保持“绝对的清高”，这显然是一对矛盾，也是我内心的纠结！于是，我经常“宽慰”自己，在充满功利、纷繁无奈的世俗社会，当我们不愿俯首低眉时，为了成就一番事业，可以选择“蹲下身来”；当我们不愿意卑躬屈膝时，为了成就一番事业，可以选择“匍匐前进”。因为，有一种成功叫做妥协，有一种胜利叫做撤退，有一种拥有叫做放弃！

徐：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谢谢！

·政治建设·

金太军教授及其团队的应急管理研究 成为政府决策依据



2011 年,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成果要报》上发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出通报,称“近期,我办《成果要报》编发了苏州大学金太军同志研究成果《创新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方式 构建维护社会稳定长效机制》,文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对策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在通报中,国家规划办对金太军教授坚持正确导向,自觉关注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推出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为国家社科基金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各类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此起彼伏,而且呈现出规模大、损失大、影响大、易扩散等特点。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对中,政府的能力尤其是协调能力直接决定着应急管理的成败。然而,政府协调能力目前存在着应急管理主体间的协调缺乏完善的制度框架、机构与人员整合有待加强、信息采集与辨识能力较弱、应急物资多种储备方式间整合不足、调

度效率不高及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亟须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关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

金太军研究团队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很强的学术敏感力,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对这个问题上,金太军研究团队早就予以了关注和研究。他们以分析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协调能力为重要切入点,着眼于政府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及其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从政府制度、政府人员、政府信息、政府物资和政府资金等协调能力,多方位多角度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团队致力于在加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整合企业和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的长效机制,建构应

对区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一体化格局。同时立足于实践,开展了大量的实证调查工作,研究团队远赴云南、河北、广东,以及江苏无锡、连云港、淮安等省、市进行了实地调研,撰写了《当前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省内政府间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昆明阳宗海事件为例》、《关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的若干对策建议》等调研报告。

理论的力量来自解释现实,改变现实。金太军及其团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更好地诠释了作为地方思想库的角色特点。该研究团队对此领域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的立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两次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并获中央领导的重视,为党和政府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该研究团队就此课题在 CS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在相关学科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团队把课题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等,已开始转化为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研究团队还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专题报告或培训讲座,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政府危机管理”、“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政府应急管理研究”等,已在省内外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全国性研讨会等演讲 10 多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内部参阅

成果要报

第 51 期(总第 824 期)

中央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2012 年 7 月 24 日

领导批示:

当前我国公民海外安全的形势及相关建议

【摘要要点】当前,我国公民海外安全形势已进入“高风险、高威胁、高概率”的“三高”时期,非传统威胁挑战加大,商务活动中非商业风险增加,安全事件中我国公民由“被殃及目标”逐渐成为“明确目标”。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力量,逐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作、国内与国外联动、外交与军事并举的海外公民安全保护体系。

- 1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关于苏州大学金太军同志研究成果 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的通报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苏州大学党委:

近期,我办《成果要报》编发了苏州大学金太军同志研究成果《创新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方式 构建维护社会稳定长效机制》,文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对策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金太军同志坚持正确导向,自觉关注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推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体现了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国家社科基金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贡献。

特此通报。



·文化建设·

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助力文化“走出去”战略

文学作为民族文化个性最鲜明的表现方式之一,能够沟通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同时,文学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是推进文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为本国文化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文学是中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在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彰显力量、丰富内涵、创新发展。在全面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际,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成为一个焦点和热点话题,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探讨中国文化输出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规避的陷阱、突破的难题,是当下文化传播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文学院院长王尧教授从 2005 年起便开始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2005 年 5 月,王尧教授研究团队与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联合主持了在苏州召开的“第三届青年汉学国际会议”。2006 年,研究团

队遴选并组织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译介。2011 年 11 月,作为发起人和会议主持人之一,王尧教授与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在苏州联合召开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2006 年开始,我校文学院设立了“海外汉学讲座”,邀请了宇文所安、李欧梵、王德威等一批海外汉学名家到校讲演,并于 2011 年出版了《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讲演录》。王尧教授研究团队还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努力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学和当代中国学术成就,应邀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纽约大学、马里兰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等作学术讲演,并出版了讲演录《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2012 年初,以王尧教授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申报了“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课题,获批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研究团队还出版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该领域内多家权威报刊针对译丛发表了相关书评,给予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以王尧教授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立足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其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学的文化输出提供了知识背景,为中国文化输出战略提供了丰富学术资源,也为中国文学输出的市场机制以及主动介入海外译介与研究的策略提供了智力支持。

以特色东吴智库建设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高校是文化继承、传播和创新的重要阵地,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高校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使命。高校应勇于突破一

切阻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瓶颈,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先进文化的建设、思想文化的创新搭建广阔平台,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吴地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文化,对吴地现代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苏州大学是吴文化研究的重镇,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2008 年 10 月,经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苏州大学“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入选首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在吴地历史文化、地域与家族文化、文学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化发展等研究方向上富有特色,近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基地成立以来,积极承担地方政府课题,发挥了服务地方的功能。如苏州市政府重大项目《苏州通史》的撰写工作。还承担了“昆山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等多项横向课题,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此外,苏州市委委托该研究基地进行“苏州文献丛书”整理工程,每年

投入经费 100 万,初步规划连续进行 5 年。该工程大大推动了吴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和研究工作。第一辑《吴郡文编》已于 2011 年 12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引起重大的社会反响。吴文化研究基地参与制定的《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得到了苏州市人大的充分肯定,并予以采纳。吴文化研究基地参与的“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帮助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常熟市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的论证,被常熟市有关部门采用。

该基地发掘采集、加工整合吴文化资源,获得 12 万余条数据,涵盖了苏州及环太湖地区的吴文化数据信息,涉及吴地春秋、文学艺术、文化遗迹、工艺美术、吴地科教、宗教民俗、吴地名胜、现代苏州、吴地研究等主要栏目。经过四年的建设,“吴文化”数据库通过了教育部(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专家组验收,并在评审中荣获一等奖,成为全国省属院校中唯一获得一等奖的项目。通过网站和数据库建设,扩大了吴文化的影响力,也为地方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文化建设·

东吴智库研究员主持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公共艺术设计项目



2013 年 3 月,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艺术学院姜竹松教授率领多位教师组成的设计团队,经过激烈角逐和多轮评审,一举获得苏州轨道交通 2 号线公共艺术项目。

2 号线公共艺术项目包含了沿线 11 个站点的艺术品设计,是苏州展示城市文化艺术品质的重要窗口。在该项目面向社会征集方案后,我校东吴智库高度重视,配备了强有力的设计团队,在姜竹松教授的具体组织下,对轨道交通 2 号线站点外部周边环境及人文历史背景做了大量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研究工作,并多次进行优化设计。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与酝酿,完成设计方案。该方案以“东方水城,丰泽彩韵”为创意主题,通过与各站点周边文化相关的多个侧面,运用多种工艺、材料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进

一步演绎和深化了苏州的文化历史和人文精神,形成了 2 号线沿线各站点独特的艺术主题。如三医院站的“七里山塘,古风醇情”、石路站的“神仙庙会,繁华金阊”、尹山湖中路站的“湿地八仙,富庶丰饶”等。全线的公共艺术设计以“安全性与艺术性统一、艺术审美性与环境功能性统一、传统文化内涵与当代艺术语言统一”为原则,充分考虑了艺术品的艺术性、审美性、当代性与轨道交通车站环境空间性质的关系,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艺术性强,获得了苏州“轨道交通车站环境艺术委员会”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认可。

2 号线的装修设计主题是“水乡彩韵”,选择“水”作为整个 2 号线公共艺术项目主题。2 号线主线及延伸线,以新兴城区为起点,擦肩老城区,再进入新兴城区,因此全线总体艺术风格呈现现代—传统—现代的特征。11 个站点的主题分别是:苏州高铁站——姑苏鱼跃、阳澄湖中路站——璀璨花韵、苏州火车站——人家枕河及园林意象、三医院站——山塘古风、石路站——南濠寻仙、三香路站——运河帆影、劳动路站——古胥竞渡、桐泾公园站——丝绸春秋、尹山湖中路站——八仙汇聚(水八仙)、月

亮湾站——月色涟漪、星华街站——江南梦影。

2 号线的最大亮点就是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公共艺术,而且留足了空间。以“苏州火车站”为例,这个站预留了两个公共艺术空间。考虑到火车站是外地游客进入苏州的一个主要窗口,所以这个站选择了水乡和园林这样两个最能代表苏州特色的元素。“人家枕河”采用平面加立体的方式,“园林意象”则采用枯山水式的缩微式园林景观表现手法。其他站点,则综合采用绘画、雕塑、装置、灯光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增强艺术表现力。用材方面,在充分考虑文化性、艺术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新工艺、新材料,赋予时代气息。

此外,姜竹松教授在 2000 年设计并主持实施的“苏州自来水公司企业识别系统”和“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发展投资公司企业识别系统”,其设计方案被收入《中国 CI 设计年鉴》。2003 年主持苏州独墅湖高教区主入口区域景观设计大型城市景观雕塑《升华》设计,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该研究团队积极投入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建设工作中,为苏州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高校的智库职能。

语言应用研究积极服务地方社会发展

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文学院曹炜教授及其领衔的研究团队,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开展横向科研合作。最近,海门市委宣传部与以曹炜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苏州大学汉语及汉语应用研究中心联合开展媒体语言系列研究。海门市委宣传部将为研究提供财力支持和材料支撑,曹炜教授及其团队将对海门市的媒体报道、广告语言、语言文字工作推广、媒体语言实践等进行深入研究,将语言文字研究应用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为海门市的文化建设提供直接的决策咨询服务。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提升文化建设软实力

互联网普及使用以来,新媒介催生出来的青年亚文化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对社会规范影响巨大。研究青年亚文化,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课题意义重大。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凤凰传媒学院马中红教授及研究团队接受共青团中央和苏州市团委的委托,展开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研究成果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一系列咨询报告和研究成果。其中,“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第一辑,7本),包括《Cosplay, 戏剧化的青春》、《网游:狂欢与蛊惑》、《黑客:比特世



界的幽灵》、《拍客:炫目与自恋》、《恶搞:反叛与颠覆》、《御宅:二次元世界的迷狂》、《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相关研究成果为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团委等部门努力建设的“新时期苏州青年精神的内涵”提供了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在此基础上,马中红教授团队还计划建构一个跨学科、跨校内外、跨行业的开放的研究平台,积极开展与海外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